

社会与发展丛书

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

邱泽奇 著

国家教委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课题
“黄河上游沿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成果之一

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

国家教委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课题

“黄河上游沿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成果之一

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

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
——国有大企业和企业型城市的集体企业
邱泽奇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300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01-02426-4/C·139

定 价:13.50元

一厂两制

(代序)

1988年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两省两区共同提出了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和方案,经过中央批准,各省区都分别开始进行具体的开发计划和工作。我通过这次去甘肃考察,对这个方案的实施很乐观。甘肃已经开动了。看来,开发大西北已不是学者们的空谈,而是千百万人民扎扎实实在干的大好事了。同时,我认为他们还为了搞活国营化企业找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子。这条路子就是国营大企业通过城乡结合、城乡一体化建立他们称为“一厂两制”的办法。

早在1984年我在包钢考察时就提出“人文生态失调”的观点。所谓“人文生态失调”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企业受到来自设备和制度的种种限制,无法消化企业内不断增长的人口现象。当时,我看到象包钢这类大企业,为了自身解决这个失调问题,在大厂里办了许多层次的集体所有制的小厂。这其实就是“一厂两制”的雏形。这几年我访问了甘肃和陕西,看到了不少国营大企业存在着同样的情况。也许可以说,“一厂两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群众性的创造,用以解决现阶段国营大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建国以来,国营企业一直是我国经济的主要成分,好几千亿元的投资,好几千万的职工,和大量的科技力量都集中在这些企业里。怎样搞活这个巨大的力量是有关国家兴衰的大事。甘肃历来是国营大企业集中的地方之一。一提到经济开发,首先就应当解决这个问题。甘肃采取的“一厂两制”的办法,把孤岛式的国

营大企业 and 地方结合起来,开办很多集体性的中小企业。预计到1990年,几个开发小区里,仅一厂两制这一块的产值就可达10亿元。

我在这次访问中,先后和白银公司、稀土公司、805厂、金川公司、酒钢公司,厂坝铅锌矿的经理人员和这些企业所在地的地方党政领导,多次讨论了“一厂两制”的经验和问题,很受启发。

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这些事实里所显现出大西北开发过程的某些特点。

从历史上看,这些地方的重大飞跃几乎都是由外注入的。没代大批汉人进入河西,把农业带了进去,改变了这里单一放牧的经济,出现了繁荣的粮食基地。建国以后,现代大工业进入西北,大批企业由中央定点,投资设立。我听到一个典型的事例,据说有一位将军奉命来甘肃建厂。他推开地图,找到了一块他认为即使发生战争,原子弹都影响不到的地方,用笔一圈现在已有几万人的与四周隔绝的稀土公司就是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建起的。

这些注入式的大企业,一开始就和当地的老百姓是分隔的。它们如同一个个自给自治的小孤岛。工厂重地,行人止步;门禁严森,设有岗哨。大西北每年报表上工业产值都不低,这些企业确实也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这些厂的产品几乎由国家调走了,留给地方上的极少。工厂周围的老百姓看不到,分不着,几十年来面貌变化极微。

大西北的广大农牧民受不到现代工业的惠泽,只是这种经济格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这类孤岛式的大企业自身也难于发展和维持。在原来的体制下,除非国家继续不断地投资,企业自身无力更新和扩建,而国家又哪里有这样大的力量呢?! 日

子久了，企业老化。然而，企业里边的人却一代代地生长，越来越多。50年代办的厂，到70年代那些厂后出生的孩子都要就业了。这些新生力量在这些孤岛式企业自身消化不了的。这个问题成了这些企业领导者最头痛的一件事。在这种很具体的压力下，“一厂两制”萌芽了。

但是，“一厂两制”在孤岛里实行还是解决不了问题。1984年我在包钢看到的那些为职工子弟开办的集体小厂就是关在孤岛里办的。它们实际上成了大厂背着的一个个小包袱。这次我在甘肃参观了几个开发小区，看来他们已经闯过了这一关。他们把厂门打开，伸出手去和地方结合，搞城乡联系。就是说，大企业提供技术、管理、运销的经验和人员和地方提供土地、设备和劳力，双方联合开办各种中小企业，利益均沾，共同负责。这种打开厂门办一厂两制的做法，为各企业职工的子弟提供了出路，人文生态调得缓解。

这种形式的扩散企业对西北地区的工业化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不能指望西北边区能像苏南或珠江三角洲那样由农民自动地引进新技术，发展自己的乡村企业。大西北工业的发展还得顺着地方特点，由上而下地注入。试想，如果不是大企业打开大门，原来的边区农民怎能到外来的现代工业？“一厂两制”不仅使大企业卸下了自己的包袱，同时工业之风也吹向了广大农村。真可谓一举两得呀！甘肃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以原有的国营大企业为核心，建立了四个“一厂两制”的经济开发试验小区：白银、金昌、西成和连海。另外还有一个性质和“一厂两制”不同的宁卧庄科技产业开发区，我在《兰花出口》一文中已经作了报导。

金昌小区里的金川公司总经理王德雍同志向我谈了他的体会：“公司在产品经济体制下的27年里，一直是单打一的搞镍和

钢的生产，路子越走越窄，困难重重。自从成立镍都实业公司，集体经济的工厂，其中几个年产值 1000 万元的厂，只用 10 个月的时间就建成投产，发展速度很快。1988 年这些集体企业的产值达 2 亿元，1989 年可达 2.7 亿元，正好是全公司 1983 年的产值。这不也正好说明‘一厂两制’发展集体经济，不仅三、五年功夫就可带出一个公司的产值，而且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

孤岛式的大厂打开大门和地方结合办中小型集体企业之后，企业和周围的群众关系也搞好了。过去厂内、厂外的差距太大。墙外看墙内是另一个世界。四年前金川公司职工的年人均收入是 2000 元，而公司周围的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 100 元。1986 年开始搞“一厂两制”，公司从技术上、设备上、资金上帮助地方发展乡镇企业，1988 年农民的年人均收入达到了 600 元，农民和公司的关系很和谐。

我在路过永登县时，参观了一个甘肃铝业公司和该县合办的碳素厂。永登县的西部大通河两岸就是连海小区。这个碳素厂就是从小区核心辐射出来，国营和地方结合办起的企业。铝业公司提供技术和管理，派有经验的人员当该厂厂。地方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动力。流动资金由双方分担。70%的产品由公司包销用于公司所属的铝厂。利润分成，公司得 5.5，地方得 4.5。全厂有 300 名工人，全是当地农民，月工资 120 到 180 元，比当地一般农民的收入明显提高。据魏县长介绍，永登县有不少像碳素厂性质一样的乡镇企业，全年产值达 1.7 亿元，全县 44 万人口中已有 11 万从事乡镇企业。永登县的面貌这几年有了显著的改变，可见开发小区的“一厂两制”已经在农村里发生作用了。

1984 年我在包头看到的厂内搞小集体和 1988 年甘肃看到

的开发小区,使我发现“一厂两制”本身有了发展,从企业闭门扩大走向企业开门扩散。扩散显然比扩大前进了一步。这条搞活国营大企业的路子是群众走出来的,“一厂两制”不失是一条很有前途的活路。

费孝通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以定性调查与定性分析为主、并结合了定量调查与定量分析的、建立在实地调查资料基础上的研究专著，主要目的是希望了解地处西北的金昌和白银这两座企业型城市和驻地金川公司与白银公司的集体企业的源起与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并给出一个解释框架。这项研究的理论考虑是，既有体制下的社会团体与个人的社会行为表现为一种什么样的自在逻辑性（不一定是合理性）？集体企业，作为社会团体的一种、同时又是其他社会团体社会行为结果的一种是如何体现体制约束下社会行为的自在逻辑性的？

具体到一个社区的集体企业（企业型城市的也罢，国有企业的也罢）是一个相对微观的社会事实，如何在微观把握的同时又获得其宏观的理论意义并能在理论层次上返回到微观中去，这是本研究试图探讨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如此，本研究试图综合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和科尔曼的命题插入法，采用了这样的研究路线：从现实事实入手，尽量避免预先的理论框架（或假设），本着把一个现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的宗旨，解剖几个麻雀，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辅之以可能得到的总体性资料，通过事实的积累提炼或借用概念，用概念去分析现象并抽象出解释性命题，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进而获得一个概括。

基于以上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取向，本书的写作沿用了研

究过程的秩序排列：从事实的描述性分析到解释性分析，进而到功能性分析，最后进行简要的概括。这样整本书被分为4个部分，各部分的要点如下：

第一部分是本研究的学术性背景，包括文献回顾、基本思想和方法论讨论三节。基本的观点是：迄今为止，对本研究所讨论的集体企业尚无人做过系统的研究。相关的文献可以包括四类，即关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和城镇集体经济。其中关于城镇集体经济的文献最少，前三类内容丰富但缺乏有机综合。在文献考察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把企业作为一个网结放到既有体制中研究，从考察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在中央与地方和国家与企业的互动中的利益主体性入手去讨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体现在集体企业这一事实中的行为，并提出了进行这项行为研究的方法策略。

第二部分是事实的描述性分析，从时空背景入手，详细地分析了集体企业的发展经历与现状。金昌和白银位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地段，河西走廊在历史上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不曾积累有特色的产业传统。在金川公司和白银公司建立之前，那里是一片荒凉的戈壁。1950—1970年，国家出于军事、资源与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考虑，在金昌和白银嵌入了一座座现代大企业。几十年后，体制的不融合性使得那里的大企业变成了一座座工业高地，在高地之内又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就业压力。1980年以后，金昌和白银先后建立和恢复了地级市，新建政府一开始便面临了财政分级包干体制所带来的“自理门户”问题。这是集体企业的局域性背景，其大背景则是中国的经济体制。计划体制下国家对各类资源的高度垄断造成了事实上的家庭就业制。国有企业中的家属问题以及1980年以后待业青年问题，形成了非国有经济

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但这种资源的运用与发挥却因国有企业利益主体性的情景不同而表现出发展的阶段性差异。1978年以前,国有企业没有利益主体性可言,加上计划外部分没有市场出路,那里的人力资源(家属工)是它的包袱,企业生产行为实为意识形态表达的工具。1978年以后的改革是国有企业获得利益主体性的过程,同时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育和社会对物质财富的共识,企业追求自我利益的动力不断强化,人力资源开始发挥作用,集体企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加上甘肃省政府的政策庇护,1987年以后,特别是金川公司的集体企业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生产体系中有机的部分;新建的地方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俨然是一个欠发育的利益主体,但为着自我的利益,它用建立经济开发试验小区的办法去块集实力,几年来也有了很快的发展。

但是,同在一个体制与政策之下,金昌市和白银市、金川公司和白银公司的集体企业却有着不同的现实格局。从企业生产的专门化程度、生产企业的规模、人财物权与产品生产单位的距离、承包制中权力与责任的匹配程度、职工结构、经理素质等源于实践的指标来看,尽管分开来看,金川公司的集体企业是金昌城市集体企业的主体、白银的情形亦然,但总体上,金川(昌)集体企业的发展水平要高于白银,为什么呢?

第三部分是一个解释框架。在现实中,作为社会团体之一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社会行为是受其领导人影响的,这一部分从代理关系(我们曾经极大地忽视了的一种社会关系)的分析入手,根据前面的描述性分析讨论了利益主体行为逻辑的自在性。认为:作为代理人,企业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是一个双重利益主体(集体的和自我的),这样围绕集体企业的各种关系就体现为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循着对收益的自我定义(收益定

义多样性),各利益主体的收益取向就会表现出类属差异,这是金川(昌)和白银集体企业发展差异的主要或根本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定义收益,利益主体总是在追求自我的收益最大化。由于约束机制的不健全和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市场正处在发育中,使得利益主体追求收益最大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寻租。本书提出,集体企业实际上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及其代理人的寻租的场所,也是寻租的结果之一。为此,这一部分还专门进行了收益分析和寻租分析。

第四部分是兼论和结束语。其本观点可表述为,团体(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在客观上为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制造了积聚点和发展极,也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制造了一个可以稳定的后方,集体企业的发展已经同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西部的发展很有可能会因为集体企业这座架在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桥梁,而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力量不断通过这座架在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桥梁扩散给地方,从而形成以企业型城市为主体的工业化道路,这将大大不同于东部的工业化道路。结束语概括了集体企业的发展阶段与类型、归纳了解释性的命题,并强调了本研究等特色与贡献。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field work, the book describes the origination,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 the collective enterprises (CE) created by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f *Jinchuan* (CEJF) and *Baiyin* (CEBF) Nonferrous Metal Companies (SOE) and created by the cities' government (CG) of *Jinchang* (CEJ) and *Baiyin* (CEB) (located in northwest China) and builds an interpretive framework to the CE, with a mixed approach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wo questions run through the whole work that are what is the interior logical rationality of a social behavior either was taken by a group or by an individual under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bounds, and how that interior logical rationality embody in the CE, which is both a social group and a result of other social groups' behavior?

Also, the CE is a micro social being, whether it was created by SOE or CG. The methodological problem is that how to study it with a micro approach but to make the result in level of macro. The research combines the methodologies of Professor Fei Xiaotong and Professor James S. Coleman. Fei prefers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Anthropology through field case studies with his approach of classific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comparison. Instead, as a theorist Coleman improves the method for framework through inserting medium propositions. Anyway, this research begins with a descriptive analysis for clarification of the process

by case studies and questionnaires, then extracts conceptions and propositions, and builds theoretical framework finally as well.

With above orientations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four parts compose the book. The basic ideas of each part can be as follow.

The first part, as a routine, includes literature review, theoretic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 Literature review shows that there have, up to now, no any systematic studies to the CE over the world as I know, but there have many relative researches on the topics of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conomic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city's and town's economy*. And these literatures never touch the CE with a mixed approaches in the national background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refore, this book prefers to take the CE as a transitional point /knot in the whole social network and to discuss the SOE's and CG's behavior for their CE through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nd interac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o examine the independence of CG, SOE and CE under the changing institutions after 1949.

The second part is a descriptive analysis, which detected the detail development of CE created by SOE and CG. *Jinchang* and *baiyin* locates in *Hexi* corridor on the silk road where there had no any traditions of industries because of wars from ancient to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In the period of 1950—1970,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ut many modern industries into that area with the purposes of defens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Jinchuan* and *Baiyin* Nonferrous Metal Companies are the cases. Decades after the these industries established, the big state—owned firms became industrial islands within the huge remote rural areas which did 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locals. And troubles with over population within the islands beca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Perhaps this is due to the plan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the islands are becoming peninsulas under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 through establishing its own enterprises called CE. Because the administrative affairs such as taxation and land using of the CE are manag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SOE, CE enable SOE and CG to be more and more independent economically. In addition, the changing financial policy encourages local government to develop its own economy. Then Economic Zone is built. These are what happen in the cities and companies I study of. Furthermore,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re never neglected in the discussion. The *independence of econom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re two main variables extracted. So that CE actually is the result of SOE's and CG's behavior for their maximal benefits.

Bu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E in CEBF, CEJF, CEB and CEJ are various. With indicators of specialization, labor division, productive scale, management system, organizational model and quality of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developed from field study, CE in CEJF and CEJ achieved higher than the others. And this situation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the results of descriptive analysis.

The third part builds an interpretive framework. It is observable that group behavior is guided by its leader. What we call a leader actually is an agent which is neglected in most of the relative researches. The attorney and property relationships determine the agent's orientations to his benefit recognition and personal behavior under a certain institution. In China, whether under a plan or market transition system, the existing or changing institutions make the agent a dual in benefit recognition and making. This implies that he must consider his own interests while he acts as an agent.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s surrounding CE can be taken as a transaction. Multi-recognition to benefit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enable the group and individual to get its/his maximal interest through rent-seeking. This book considers that the CE is both a market and a result of group rent-seeking by SOE and CG, in which there is a detail analysis about benefit-making and rent-seeking.

The fourth part deals with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It points out that group rent-seeking ma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positively. In another word, the development of CE creates a bas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stead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SOEs. And negatively, the development of CE may lead to corruption and local independence politically. That means the functions of CE like a sword, not a knife.